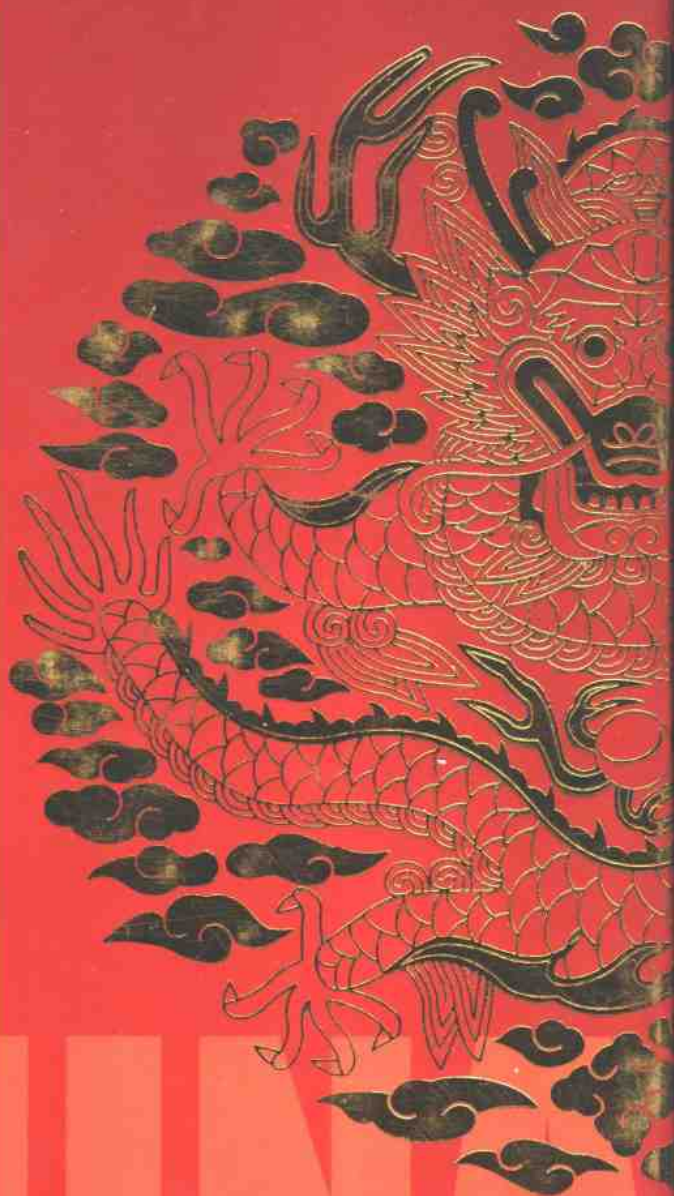


中。皇。嘉。帝。嘉。后。百。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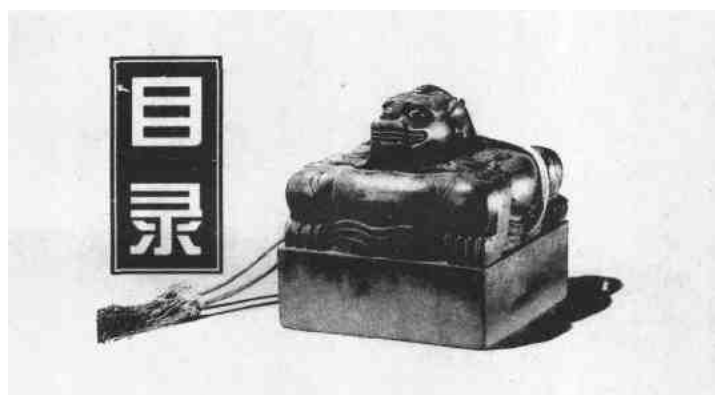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杨
坚

远方出版社



第一章	艰难时世	(1)
第二章	关陇子弟	(25)
第三章	少年得志	(67)
第四章	入宫辅政	(94)
第五章	除旧布新	(124)
第六章	统一中国	(144)
第七章	开皇之治	(189)
第八章	绥服四夷	(223)
第九章	勤政恤民	(252)
第十章	任能使贤	(261)
第十一章	皇储之争	(268)
第十二章	悲戚晚年	(292)
第十三章	矛盾的性格	(316)

HA251/64



第一章 艰难时世



杨
坚

西晋永嘉五年（311），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今河南省鹿邑东）宁平城追及送西晋太傅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余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墓，尽掠府库，焚烧宫庙，熊熊大火吞没洛阳，吞没几百年的中原文明积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经此一役，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五年之后，也就是西晋建兴四年（316），遭受匈奴刘曜长期围困的长安城，孤立无援，粮尽食绝，城内户不满百，太仓仅剩面饼数十枚，愍帝走投无路，只好乘着羊车，抬着棺材，肉袒衔璧，出城投降，西晋王朝灭亡。

翌年十一月，匈奴皇帝刘聪出城打猎，让愍帝全副武装，持戟前导。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百姓沿途围观，指指点点；中原父老，歔歔流涕。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令愍帝青衣行酒，执盏洗爵；连刘聪上厕所时，也让愍帝拎着马桶盖，随侍左右。西晋降臣见此光景，不禁悲从中来，尚书郎辛宾抱着愍帝失声痛哭，当场就被拉出去斩首。凌辱折腾够了，年仅十八岁的愍帝还是被打发上黄泉之路，演出了西晋王朝最凄





惨、最耻辱的一幕。

招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腐朽无耻的西晋统治者。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满足私欲，不惜发动内战，把锦绣山河沦为一片血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耻的，是他们竟然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公然勾引胡族为羽党，为其冲锋陷阵，残杀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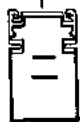
首先勾结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是“八王之乱”后期的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颖以匈奴左贤王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将兵在郾城（今河南安阳），结为羽翼；而司马越则招引鲜卑和乌桓入讨司马颖，蹂躏中原。至于边疆大员更是积极勾结胡族，例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鲜卑段务勿尘和宇文部素怒延，以胡族作为其进退割据的军事资本。就这样，毫无道义可言的“八王之乱”演变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统治阶级的内讧发展成为民族对抗。

西晋社会内部本来就潜在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抚绥。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大发横财。例如，后赵创建者石勒就被东瀛司马腾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旗号，劳动者平时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杀红了眼，杀昏了头，仇恨蒙蔽了双目，分不清是非敌友，只晓得种族异同。最典型的事例如后赵冉闵于都城驱杀胡人。

（冉闵）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





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电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相互仇杀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中国的人口从二千三百万锐减至一千余万，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地控诉道：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在这场祸乱中真正受益的是少数族统治者。他们借“八王之乱”的机会崛起，将西晋统治者发动的内战转变为推翻西晋王朝的战争。少数族原受奴役，文化水平不高，军事力量也不是那么强大。因此，他们必须依靠战争掠夺来激励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在进入中原之后，还必须极力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以此作为凝聚力，把国家政权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后赵末年，石虎（字季龙）的残暴统治天怒人怨，为了转嫁政治危机，他再次祭起种族仇恨的幽灵。

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鄴北，广长数十里。……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

自西晋主力被击溃之后，中原地区已无法形成统一的、有组织的军事抵抗，以农耕为业的汉人挡不住少数族骑兵的暴风骤雨。永嘉乱后，汉人受尽欺凌虐待，而“汉”字也多为骂语，如汉狗、痴汉、恶汉、汉子、一钱汉、卑劣汉、无赖汉等等，流毒甚远，乃至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亦言：“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



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贱视汉人，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显著的特点。

随着少数族政权的巩固，汉民族也伴随着恢复生产、重建社会的进程而复苏伸张。继续歧视汉人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并将危及少数族政权自身的安定。有远见的政治家切身感受到吸收汉族文化、重整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于是，北魏孝文帝断然采取全面汉化的政策，以求在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中实现政权的脱胎换骨，变军事国家为政治国家，以适应农业化社会的需要。

然而，百余年民族压迫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成见，却在这脆弱激进的改革中激化。虽然汉化已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存在与发展、势不可当的历史潮流，但在缺乏文化传统的胡族权贵眼里，看到的只是昔日为人贱视的汉人纷纷登上政坛，一系列强化中央政权的措施危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民族矛盾的沉渣泛起，并以“六镇暴动”的形式猛烈迸发出来。边镇鲜卑将士再次用铁铸的利剑、鲜血写就的语言，作最后的挣扎，力图把中原社会再度拖入民族对抗的深渊。乘时继起的高欢集团就是以六镇鲜卑为骨干，利用民族矛盾而兆基霸业的。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此所谓“胡汉分治”的实质，是鲜卑族对汉族的奴役欺凌，视汉人犹如革菅，明显是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反动。

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刘）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



在少数族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社会以崇武为时尚，贵戚子弟“竞习弓马，被服多为军容”，是非准则屈从于武勇实力，伦理道德在政治权力的蹂躏下呻吟，日益凋落的汉族文化为专擅杀伐的塞北胡风所笼罩。鲜卑语不但成为华北的通行语言，而且还成为判定个人政治忠诚的标志。北齐的孙搴学浅行薄，却因为能说鲜卑语而大受齐高祖高欢重用，宣旨传令，颇掌机要。权臣祖珽有才无行，平日与一帮纨绔子弟渔猎声色。齐高祖宴请臣僚，他旧习难改，顺手就把席上金器藏入帽中，当场被捉住。后来又诈盗官粟三千石，锒铛入狱，可是因为他精通鲜卑语而获释，依然故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鲜卑语的流行，直接推动塞外文化习俗向中原地区的浸淫弥漫。戎乐胡舞、羌笛琵琶、握槊走马，盛行于世，尤得权贵耽爱。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史丑多、沈过儿、王长通之流，因能歌善舞而封王开府；和士开一手琵琶绝技，竟登相位。西域深目高鼻的胡人小儿，虽文墨不通，亦以音乐至大官，甚至连波斯狗也得封仪同郡君，享受俸禄。皇宫之内，白天走马驱驰，夜来胡音哀曲，阉官胡儿，齐声唱和。曲终歌罢，涕泣痛哭，此起彼伏。

接受胡俗，刻意模仿学习，就表明对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认同与归依，成为进身仕途的敲门砖。北齐有位士大夫不无得意地向入密授当官诀窍：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民族歧视的政治高压，使得胡俗不断渗透于汉人社会。祖珽与京城少年歌舞为娱，樗蒲为戏。更有甚者，一些汉人学会南腔北调的胡语，因游戏见宠，便忘记了自己的出身。昌黎（今辽宁义县）人韩凤在北齐当权，便以残害汉族士人为能事，制造冤案，于朝中厉声痛骂：“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毫无愧色。相反，学习儒家汉学就会被视作异己，招致不测。北



齐废帝高殷，勤奋好学，温文尔雅，其父文宣帝便觉得他颇似汉人，屡欲废之。有一次，文宣帝登金凤台，强令他手刃囚徒，他不忍下手，竟遭文宣帝鞭挞，直吓得当场神经错乱。

胡化的结果导致了社会的粗鄙化和政治的野蛮化。当政权巩固、生产发展之后，国家以军事为主导的外向扩张就日益转变为以提高君权为导向的内部体制建设，重新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强有力的管理统制。这时，草原马背上发展出来的管理模式不能适用于农业社会，部落酋长联盟式的寡头民主制不能适应于提高君权的需要。于是，恢复以忠孝尊卑为核心的等级礼制再度成为紧迫的课题。“六镇暴动”虽然暂时迟滞了这一进程，但却无法完全阻挡它。所以，汉化并不是一个种族优劣、文化高下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经过长期少数民族统治和胡化浸染的中原社会，汉化不可能也不会是简单的复古倒退，回复汉晋文化制度，它必然包含着扬弃旧文化与吸收新文化要素两个方面。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要解决民族与文化的融合问题，而且是要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心理，重新整合分裂的社会，成为最深刻与稳定的文化内核，达到深层的强有力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远比军事占领和领土统一更加艰巨复杂。历次汉化运动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极具感情色彩的民族冲突，但究其实质却是鲜卑族社会进步面带来新旧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内在矛盾的激化。那么，对于积极推进汉化运动以求重新统一中国的政治家，他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社会呢？

二

西晋政权崩溃之后，中国北方出现的政治权力真空，诱使边疆各族蜂拥而入，抢夺瓜分这片富庶沃土。最初是匈奴，而后，羯、鲜卑、氐和羌族接踵而至，纷纷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政



权。这些互不统属的少数族统治者，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原有的羁绊被冲决了，掳掠战利品（财物、人口和土地）成为最主要的目标。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之下，他们谁也无法取得公认的正统地位。神圣的权威被打碎之后，实力代表了一切，胜利就是真理。这样，战争作为衡量是非的最高语言，不停地轰鸣。西晋灭亡后的弹指一挥间，十六个少数族政权遽兴旋灭。

阵阵的狂飙，如雨的铁蹄，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惊涛骇浪之中，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

早期的坞壁是为避乱而组建的，所以大都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等坞名所示，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这样，在国家地方行政组织之外，游离出大量不受管辖的村落组织。

国家政令不行，则坞壁势必要自行制定一套内部规则，将四方汇聚的流民统一起来，整齐号令，使之成为团结一致、且战且耕的坚强组织。《晋书》卷八十八《孝友·庾袞传》记载：

〔庾袞〕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星罗棋布于战乱地带的坞壁脱离于国家政权之外，自定法规，各行其是，犹如一盘散沙。“五胡十六国”动乱所造成的最深刻影响，并不在于皇室的更替，而在于这场浩劫把一个自上而下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撞成碎片，瓦解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集团，而胡族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更加强了这一趋势。这一点，是我们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出发点。诚然，大一统局面的崩溃，冲决了思想的禁锢，带来了个性的解放和艺术创造精神的昂扬，然而，这一切乃是由政治的黑暗和士大夫内心的痛苦所铸就的。

林林总总的坞壁，差别甚大。敦煌石室本《晋纪》记载：“永嘉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从几百户到数千家，坞壁的规模，相去甚远。然而，透过这些表面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其基本形态却是共通的，这就是宗族构成了坞壁集团的核心，而其推举产生的坞主或行主一般都是乡里豪帅。当然，他们中间不乏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但是，他们的权力并不来源于官场经历，而在于其通过宗族对乡党及流民的控制。也就是说，西晋政权的崩溃和大家世族罹难遁逃，给了下层豪强充分的表演机会，使他们能够乘时而起，啸聚一方。

战乱时代崛起的坞壁及其豪帅，构成了南北朝时代动乱的温床和门阀政治的基础。这些坞主豪帅，兴起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虽然与以往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冒充老牌世族，但实际上可以得到确证者为数不多。因此，他们并不是前代世家大族的简单延续，不能毫无甄别地混为一谈。

上层为争夺政权的殊死搏斗，造成社会的失控。在基层，形形色色的坞壁也在为自身利益和生存空间而殚精竭力，实力政治的法则，使得他们或者相互吞并，或者结成联盟。风暴过去，尘埃落定，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牵制的格局下，有实力的坞壁广泛得以保存，强宗大族号令乡村、割据一隅的局面也随之

固定了下来。他们中间，更产生了一些以“统主”为代表的地区性集团，例如，河东地区的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峙之势”；“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

如果说天下大乱和社会黑暗，使得个人生命和正当权利失去保障而不得不依赖私人武装的庇护，是坞壁兴起的外在要因，那么，当政局相对安定，国家职能日益发挥作用，而坞壁的主要功能也由武装自卫转变为日常生产活动之后，坞壁或强宗大族垄断乡曲的局而能够长期保持下来，则只能从坞壁内部寻求其内在原因。《晋书·苏峻传》记载：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

苏峻得到诸屯的拥戴，除了其实力最强的因素外，更在于其推行“王化”，使“远近感其恩义”两点。

所谓行“王化”，实质就是以儒家宗法原则统辖坞壁。《宋书·王懿传》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北方原来就重同姓宗法关系，在坞壁内部更是如此。前述庾袞事例里，庾袞率其同族及庶姓保聚禹山，以其心腹为坞壁内的邑长、里贤，将坞众编为部曲，使整个坞壁笼罩于宗法关系之下，并律之以“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的大义，组成坚强的团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具体运用。所以，在社会分裂为坞壁林立的情况下，随处可见的是宗族社会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大幅度加强。

与宗法关系相辅相成的，是通过贯彻儒家共同体理想而重组乡里社会，赍鉴在乡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



甚多”；祖逖率众南迁时，“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庾袞在坞壁内“均劳逸，通有无”，使“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魏晋南北朝时代新起的强宗大族与以往腐朽的世族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乡村，与乡党民众生活在一起，通过实行一些扶弱济困、有无相通的“恩义”措施，激发乡党民众感恩戴德的情感，造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乡土观念，从而获得其诚心的归属，奠定了垄断乡村的坚强的权力基础。特别是在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政府的苛政甚于豪强的剥削，驱使农民大量流入豪门，更加强了乡村豪族的地位。例如，萧梁的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形成豪族与政府争夺劳动人手与控制乡村的局面。

以宗族乡党为背景的强宗大族，其向背直接关系到社会乃至政权的安定。后赵石勒倾注全力去攻打各地坞壁，即可略示一斑。然而，只要分裂动乱的局面没有消除，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则单凭武力镇压无济于铲除遍地生根的坞壁。而且，外部势力也不易控制坞壁。西晋末年，魏该让其部将马瞻袭杀杜尹，夺其一泉坞。魏该打算南徙，却因坞众不从而不得不单骑出走。马瞻投降匈奴刘曜后，坞众又密请魏该回来，共诛马瞻。这一事例清楚表明，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北魏人主中原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通典·乡党》说：

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





于公赋矣。

“宗主”就是垄断乡村的豪族，他们不少实由坞主演变而来。《北史·李灵传》记载：“（李）悦祖弟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不仅中央政府要任用大批强宗大族以巩固政权，而且，地方官员也不得不致力于网罗豪强来实施统治。陆綬任相州刺史时：

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

国家政权固然因强宗大族的合作而稳定下来，但分裂的因素也因此潜藏于政权内部，造成国家权力的不完整。至于那些桀骜不驯为害一方的豪强，更是国家政权的心腹大患，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再掀波澜。这种局面，南北王朝概莫能外。《关东风俗传》说：

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翊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

显然，强宗大族对乡村的垄断，已成为国家统一的赘疣。

东汉末年，以“党锢之祸”为分水岭，身分性官僚世族迅速走向衰落。西晋复兴，虽说是门阀世族在对寒门庶族的斗争中暂时获得胜利，但是，这时期世族所暴露出的极端腐朽贪婪的面目，并没有带来重振世族政治的结果，充其量不过是短暂的回光返照苟延残喘而已。贾皇后囚杀杨太后，把西晋统治者所标榜的儒家孝道名教践踏得鲜血淋漓，“八王之乱”的骨肉相残，更把忠孝伦理和门阀世族彻底葬送。





西晋之前的曹魏政权曾试图改变门阀政治的局面，用“唯才是举”向世族发起强劲冲击，但曹操好施权术，为政苛细，任人选官上片面强调实用主义标准，甚至不惜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赤裸裸的法家政治，无助于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和挽救颓败的伦理道德，却助长了唯权是视的思潮，曹魏政权为其选用的寒族所出卖，被旧世族所推翻，亦属自食其果。

世族和寒族统治者都无法挽救东汉以来社会崩溃的趋势，而贪婪、腐朽和唯力是视、沆瀣一气，反倒加剧了社会的黑暗不公。乡里豪帅更使社会四分五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分裂时代。

社会基层骤然兴起的乡里豪帅，且不论他们原来属于流民或地主武装，曾经起过抵抗民族压迫和保护乡村的作用，在国家重新统一和社会经济逐步恢复的进程中，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的使命，逐渐演变成为破坏统一的基本因素。而且，当强宗大族垄断乡里的局面长期固定下来之后，抵抗外来入侵已被日常的经济关系所代替，宗族共同体温情脉脉的面纱再也掩盖不了剥削压迫的事实。于是，国家政权着手对地方豪强展开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北魏孝文帝变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其深刻意义就在于此。

社会阶层不能通过行政或暴力手段加以消灭。北魏孝文帝变宗主为三长，使三长隶属于郡县，纳入国家体制，逐步削弱了他们的独立性和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体现出国家制度的优越性，用经济手段把豪族的依附人口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在于消除分裂隐患，增进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必须指出，这一进程是在国家与地方豪强既斗争又妥协的基础上进行的，大量的豪强进入国家政权之中，则国家的门阀政治色彩必然浓厚。只有通过多种渠道，进一步把地方豪强从其所把持的乡村



游离出来，转移到各个城市里去，国家权力才能强有力地贯彻到乡村基层，实现一元化政治统治的目标。显而易见，隋唐帝国正处于从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到宋代官僚政治的转型建制时代，问题深刻而复杂，任重而道远。

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坞壁兴起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强宗大族控制乡村的重要支柱，还在于贯彻一系列体现共同体的理念原则。这实际上包含着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新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蕴含着构建未来社会的养料。因此，政治清明，一定程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对人身权利的保障，把一些原属于乡村社会的理念升华融入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才能使新政权获得稳固的基础。换言之，在推进政治与经济统一的时候，还必须达成更加深层的文化统一。隋朝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后，势必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总结，并开启一代风气。艰巨的任务要求隋朝统治者必须具备兼收并蓄的胸襟、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对现实有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进程。然而，与破碎山河几无二致的是，长期分裂造成的道德沦丧和个人对社会的离异，使得文化重建的基础是那样的脆弱。

杨
坚

三

东汉后期，董仲舒以统一帝国为前提构建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已经日暮途穷。此后，腐败的政治，频繁的灾变，加深了这场信仰的危机，而黄巾起义更予以致命一击，使其崩溃瓦解。曹操为代表的寒门势力企图用权术名法来重新构建新的统治秩序，其努力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尚不足以成为新的时代精神，所以在门阀世族的反击下，归于失败。西晋王朝的政治支柱是世家大族，与此相适应，司马氏抬出“孝”字，企图循着儒家





学说的老路，导孝为忠，收拾人心，用门阀来巩固政权。不难看出，东汉以来的思想变迁，主要不是由于理论自身运动所造成，而是由社会政治危机而引发的。

西晋强调孝道，宣帝、景帝、文帝和武帝，丧亲皆服哀三年；司马昭执政，一日同时任命王祥、何曾和荀颢三大孝子为三公，以此表率天下。王祥是二十四孝之一，据说其继母病时想吃活鱼，他便脱衣开怀，趴在河床上，解冰捕鱼。何曾一年到头只见妻子两三面，每次见面，必正衣冠，南面木然端坐，其妻北面再拜上酒，寒暄数语即离去。这类国家大肆渲染表彰的模祥，不仅矫揉造作，惺惺作态，而且扼杀人性，难见真情。更为重要的，是西晋提倡的统治伦理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自东汉王朝崩溃以来，以人的觉醒为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日益深入，而西晋片面强调的孝道，非但没能反映时代精神，而且，其支离破碎的说教，还远远不如董仲舒的理论体系。

落伍的统治理念与腐朽的门阀政治交织在一起，更显现出虚伪的一面。西晋重臣贾充，出身于市井寒门，其父受曹操重用，借此登上政治舞台。晋移魏祚，贾充投靠司马懿，率部刺杀魏帝曹髦，既为司马氏夺权扫除最后障碍，又为司马氏保全了儒家名节。他的两个女儿，丑陋淫荡。长女贾南风，身材短小，皮肤青黑，性格残忍，嫉妒好淫。然而，就是上述孝子荀颢力荐她温柔美貌，使她成为惠帝皇后。悍妇痴夫，晋室祸乱，由此发端。贾皇后野心勃勃，虐待成狂，发作起来，要亲手剖杀孕妇，看着腹中孩儿随刀落地，方解心头之恨。洛阳有位抓盗贼的俊俏小吏，藏有华丽珍贵的衣服，上司怀疑他作贼，捉来审问，才知道是被贾皇后派人勾入宫中，作成好事而得到的奖赏。惠帝登基，贾皇后图谋夺权，指使楚王玮和东安王繇诛杀杨太后的父亲杨骏，废太后为庶人，又处太后母亲庞氏极刑。临刑前，杨太后抱着母亲嚎啕痛苦，磕头剪发，上书贾后，称妾乞怜，请求保全母亲一命，但贾皇后置之不理。杨